

我们还能阻止国际化的终结吗？

保琳娜·拉托雷、乌韦·布兰登堡、汉斯·德·维特

保琳娜·拉托雷 (Paulina Latorre)：意大利米兰天主教大学 (Università Cattolica Sacro Cuore Milan) 高等教育国际化中心博士生

电子邮件：paulina.a.latorre.b@gmail.com

乌韦·布兰登堡 (Uwe Brandenburg)：捷克共和国全球影响力研究所 (the Global Impact Institute) 执行主任，法国 ESCP 商学院 (the ESCP Business School) 访问教授

电子邮件：uwebrandenburg.ub@gmail.com

汉斯·德·维特 (Hans de Wit)：美国波士顿学院 (Boston College) 国际高等教育中心荣誉教授、国际大学协会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ies) 高级研究员

电子邮件：dewitj@bc.edu

2011 年，我们中的两位作者（乌韦·布兰登堡和汉斯·德·维特），在《国际高等教育》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国际化的终结》的文章。我们认为，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已经从机构关注的边缘发展到了核心，但尽管它获得了更多的道德意义，其内容似乎却在退化。我们观察到，在国际化的旗帜下，商业化日益加剧，而在我们看来，这种态度加剧了国际化的贬值和防御性措施的膨胀。我们认为，“逐渐地，‘为什么’和‘目的’已被国际化成为主要目标所取代：更多的交流、更多的学位流动、更多的招生。”我们呼吁，必须以其本质的意义来理解国际化和全球化——国际化不是目标本身，而是达到某种目标的手段——并且要摆脱无知的面纱，问问自己：我们为什么要做某些事情，它们如何帮助实现全球化知识社会中教育和研究质量的目标？我们指出，必须将流动性和其他活动视为它们真正的意义：活动或工具——因此，它们本质上不是目标本身。最后，我们得出结论：“最重要的是重新思考和重新定

义我们当今如何看待高等教育的国际化。”

12 年后，国际化还有未来吗？

这篇文章在当时像是一声警钟，引起了广泛共鸣。那么，12 年过去了，我们现在的处境如何？国际化的终结是否更加临近，还是我们已经扭转了潮流？为了讨论这些问题，我们与智利合著者保琳娜·拉托雷 (Paulina Latorre) 一起，于 2023 年 9 月在荷兰鹿特丹举行的欧洲高等教育国际化协会会议 (EAIE Conference) 上组织了一场题为《国际化终结 10 年后，国际化还有未来吗？》的会议。

回顾 12 年前的情况，结果并不乐观。对于许多人来说，国际化仍然是一个仅仅从北方机构复制过来的过程，未能真正与当地的现实情况相结合，也没有与机构的优先事项产生共鸣。国际教育仍然在许多方面主导着议程，而“本土国际化”却远未得到足够关注。对国际排名的关注越来越成为主流，这使得某些学校比其他学校更具优势。南北差

距，以及被评为世界一流大学的学校与“其他学校”之间的鸿沟依旧存在。国际化变得更像是竞争和市场化的代名词，而非其传统价值观（合作、交流和服务社会）。不平等和排他性在国内外都在加剧，这在一定程度上与国际化的精英主义方法有关。虽然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需要在大学政策和战略中整合教育的各个方面，但这一进程仍然是缓慢且不均衡的。

尽管有一些反制措施试图扭转这种消极局面，比如本土课程的国际化、虚拟交流和跨文化在线学习（Collaborative Online International Learning，简称 COIL）、为社会服务的国际化、以及国际教育中的去殖民化和气候变化行动运动（climate change i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简称 CANIE），但在高等教育机构层面，更具社会责任化的国际化更多的是停留在口号上，而非实际行动，往往只是一些良好的意图和孤立的实践。2015 年关于国际化的定义强调了公平、包容和对社会的有意义贡献，诸如伦理的、人文的和负责任的国际化等标签也体现了国际教育工作者的共识：即需要从竞争和市场化转变的根本性变化。我们可以看到一些良好的意图和举措，比如在鹿特丹举行的欧洲高等教育国际化协会会议。然而，2011 年文章中关于国际化展示及像国际教育者协会（NAFSA）等组织的商业化问题的观察，至今仍然成立。我们是否真的在实践我们所宣扬的那（换句话说，国际化是否如我们所理解的那样依然存在）——还是它的终结真的已经来临？

多个危机呼吁行动

这个问题如今比 12 年前更加紧迫。我们

面临的不是单一危机（新自由主义市场化），而是多个危机同时爆发：新冠疫情及新疫情的威胁、民族主义的反国际化运动、对民主的攻击、种族主义、数字化与人工智能（AI）、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不断加剧的不平等和排斥、气候变化，仅举几例。这些危机要求的远不止空洞的言辞和声明。它们要求国际化应关注大学领导者、国际教育工作者、教师、学者和学生的行动，确保国际化既对社会负责，也尊重所有形式的多样性。如果我们不采取行动，国际化的终结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近，特别是在全球北方，疫情之后，市场化的旧常态似乎重新占据主导地位，而在全球南方，人们则更为意识到这种方式的负面后果，感受到了排斥和不平等的影响。来自拉丁美洲的参与者在欧洲高等教育国际化协会会议上自豪地说道：“全球南方正在崛起。”

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没有真正改变？我们需要做些什么才能最终看到国际化承担应有的责任？在我们看来，国际化 1.0 时代的特点是少数人相对无结构的流动，主要带来个人收益（直到 1990 年代初）。从那时起，国际化 2.0 主要关注的是机构层面的国际化。一方面，国际化的制度化催生了良好的运动，例如结构化的伊拉斯谟（Erasmus）计划、全面的国际化、追求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校园项目及大学。然而，这也意味着责任和问责制落在了机构身上，而非个人。正如我们所见，机构通常在变革和社会责任方面发展得非常缓慢。这使得我们个人可以与危机、后果和责任割席分离，声称是机构需要承担责任并进行变革，而我们作为个人却可以免责，例如不必要地乘飞机去参加会议，或是未参与难民危机等。在国际化中，问责制最多是体

现在机构层面，而从未体现在个人层面。

终结——或者是新纪元的开始？

因此，在欧洲高等教育国际化协会会议上，我们勇敢宣告，依赖于机构国际化的时代已经结束，并提倡需要一种以个人为主的国际化，强调我们的社会责任和包容性。

这意味着：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识别出对我们个人来说最为重要的目标或危机——我

们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因此需要优先考虑。

这可能意味着专注于气候变化、包容性、南北差距或任何其他重大问题。接着，我们需要在自己的工作中塑造国际化，使其有助于解决这些问题，并感到自己对其负有个人责任。

通过这种方式，一种国际化的终结或许正意味着新国际化的开始。